

红旗

HONGQI

4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四期 ★

目 录

人民公社在前进..... 陶 铸 (1)

——广东农村人民公社五年经验的基本总结

花县真正变成了“花县” 张汉青 (13)

“四个第一”的辩证法..... 郭力军 (18)

哲学研究要面向当前革命斗争..... 关 锋 (26)

学会“一分为二”的方法..... 卢国英 (29)

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 游 麟 刘俊望 (34)

☆ 二月二十六日出版 ☆



人民公社在前进

——广东农村人民公社五年經驗的基本总结

陶 鑄

一九五八年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五亿多人口的农村，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实行了一次偉大的社会变革，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人民公社。五年来，广东省人民公社和全国各地人民公社一样，以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在发展农业生产，战胜自然灾害，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陣地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它經受住了严峻的考驗，日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依靠人民公社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我国的农业問題必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国人民公社的偉大实践，以及在这个实践中逐步完善的政策，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宝庫增添了嶄新的篇章。

众所周知，农业問題，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問題。如何正确地处理农业同工业以及其他經濟部門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經濟問題。

对于資本主义条件下农业和其他經濟部門的关系，馬克思曾經作过很多的論述。他說：“能够投于工商业上面而无須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数……是取决于农业者在他們自身的消費額以上，能够生产多少的农产物。”^①又說：“实际上，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一切剩余价值生产的自然基础，从而也是一切資本发展的自然基础。……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尤其是資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②这就是說，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資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必須以农业的发展为条件。可是，在以資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資本主义社会里，工业和农业之間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一般地說，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这是資本主义国家国民經济各部門間的比例遭到破坏、发生危机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

那末，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这一規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起作用呢？它不但起作用，而且显得更为重要。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列宁曾經指出：“我們的国际环境既已改善，一切政治問題就都集中到一个方面，即无论如何要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会促进我国工业的发展。”^③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是社会主义社会

① 《剩余价值学說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頁。

②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24--1025頁。

③ 《在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6頁。



的一个经济规律，而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正是其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这种比例关系，使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互相适应，使整个国民经济迅速地向前发展。同时，还应当看到，一直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建设，都是在帝国主义的经済封锁和军事侵略威胁的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要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增加对世界各国人民正义事业的援助，都必须坚决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取得在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而要在经济上独立自主，没有发达的工业固然不行，没有巩固的农业基础同样是不行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忽视农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不认真地解决农业问题，要建立强大的工业是办不到的；即使工业在某些方面一时有了比较高的发展水平，而农业却裹足不前甚至越来越糟，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也必然会遭到破坏，使经济建设遭到巨大困难，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无法前进。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向来是十分重视农业的，不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或建国以后，都一直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最重要位置上，正确地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问题。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同志一再提醒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而孤立地进行，必须处理好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以发展农业作为出发点，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贯彻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使我国农业生产得到更快的发展，迅速地做到满足城乡人民对农副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保证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相适应，给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和资金，开辟广阔的市场，促进工业更快地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又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主导作用，强有力地支援农业，为农业的技术改造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创造条件。这样，有了强大的农业作为基础，又有发达的工业作为主导，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就能够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按比例、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确切地表达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和工业以及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内部联系，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社会主义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使农业真正发挥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的作用，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页。



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毫无疑问，维持小农经济的状况是不可能的；同样，资本主义大农业的道路，更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实现农业集体化，这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走的共同道路。我们党严格地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坚定不移地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党提出的改造农业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我国在彻底实现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就不停顿地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经过几种不同阶段的灵活的过渡形式（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得全国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农业的合作化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我国的粮食和棉花等生产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从而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新高涨的局面。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大大加强了，从而开始为我国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了物质条件。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这就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他们普遍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多种经营，迅速改变我国农业的落后面貌。这样，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一种比较小规模的集体经济组织，它的局限性、它所存在的矛盾就很明显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需要在更广的范围内互助协作同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小的矛盾，要求综合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多种经营同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单一的矛盾，农业生产合作社相互间生产上需要适当协作同社与社间分散经营的矛盾，如此等等，都要求突破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狭小的范围。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很多地方的农民群众自动地合并和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地方还进一步组织了联社，这些联社已经初步具备了人民公社的特点，实际上是人民公社的雏形。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总结了人民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于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地迅速开展起来，大规模的、多种经营——特别是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便成为我国农村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个情况表明，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有了人民公社，就可以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且有了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我们就找到了使集体所有制农业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具体途径，引导我国的农村将来能够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

二

人民公社诞生以来的五年，是我国农村发生巨大变化的五年。广东的情况也完全是如此。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农业生产大大发展了，农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改善了，人民



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五年内，广东遭受到两次特大自然灾害：一九五九年大水，一九六三年大旱。但是，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两次巨大灾害都被战胜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九六三年虽然遭到了六十年未有的大旱，连续八、九个月未下过透雨，但粮食生产却获得了丰收，全省比一九六二年增产十一亿斤。在这一年，广东有十六个县、市的水稻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或者超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亩产八百斤的指标。经济作物和畜牧业也获得了大幅度的增产。甘蔗、黄麻都比一九六二年增长百分之八十以上，生猪存栏数比一九六二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呢？这是因为，五年来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优越性，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第一，兴建了大批的农田水利工程，部分地区开始实行机械化和电气化，大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据统计，全省现有大、中、小型蓄水工程九万零五百一十五宗，总蓄水能力达三百亿公方，除用于发电和防洪外，可用于灌溉的蓄水库，容水量达一百四十亿公方。其中大型水库二十二个，中型水库一百七十三个，除一个大型、十八个中型水库是一九五七年前兴建的外，其余全是公社化以后兴建的。全省现有大、中、小型引水工程十二万宗，设计引水量一千九百秒公方，其中大、中型工程三十六宗，全是公社化后兴建的。全省现有电动排灌设备二十四万六千七百匹马力，全是公社化以后兴建的；机械排灌设备十三万五千九百匹马力，百分之八十以上也是公社化后发展起来的。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有了这些水利设施，农业生产的面貌就大大改观了。全省三千几百万亩水田，解放初期多数是“望天田”，有保证的灌溉面积（抗旱能力在六十天以上）不到一千万亩；一九五七年也还只有一千四百万亩；到了一九六三年，有保证的灌溉面积就增加到二千四百万亩。如果将现有水利工程全部配套，并加强管理，提高效益，全省有保证的灌溉面积将达到三千万亩左右。也就是说，到那时约百分之九十的水田都可以保证得到灌溉。

这几年，除了水利排灌方面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和机械化以外，在耕作方面也开始部分地推行机械化，拖拉机和其新式农具都有了相当数量的增长。

第二，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推行了农业耕作技术改革。通过农业耕作技术改革发展农业生产，本来是广大农民的普遍要求，可是在过去个体经济的时候却很难办到。个体经济是极脆弱的，没有条件也不敢冒技术改革的危险；而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受到人力、物力的限制，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人民公社成立以后，随着集体力量的加强和农田水利条件的改善，各地普遍地积极地进行了各种农业技术改革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很多县、公社都有了一定数量的农业科学技术队伍，比较普遍地设立了农业科学试验站，它们在合理密植、培育和推广良种、改良土壤、改革耕作制度、改进耕作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拿培育和推广水稻良种来说，公社化后各地都抓得很紧，效果十分显著。全省有不少县，从县、公社、大队一直到生产队，都建立了种子员和种子田制度，选育和推广良种已成为群众



性的行动。广东原来早稻品种缺点较多，经过几年来的选育和推广，现在全省大部分地区，早稻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良种化，有效地提高了早稻的产量，改变了以往水稻产量“早四晚六”（即一亩双季稻全年产量早造占四成，晚造占六成）的情况，而成为“早五晚五”了，今后的任务是进一步选育和推广晚造良种，提高晚造产量。推广良种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过去推广一个新品种要经过四、五年时间，现在两三年就可以了。水稻的合理密植，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各地就曾经提倡过，可是不能广泛推广。公社化后，由于公社的积极领导和推动，由于农业科学试验站的试验和示范，逐步找到了适合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品种的密植规格，水稻的合理密植业已成为群众的习惯，现在全省基本上都实行合理密植了。

第三，在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下，更好地做到了综合利用资源，合理地利用人力和地力，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副业生产。这是农业逐步摆脱由于小规模经营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局限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年来全省有许多公社都对所属各生产队的生产作了合理安排：商品粮产区的，集中力量生产粮食，结合发展畜牧业；经济作物区的，除粮食生产外，适当多种花生、甘蔗等经济作物；靠近城镇的则多种蔬菜和饲养群鹅群鸭，并安排剩余劳动力经营短途运输等临时副业。国家也根据各生产队的生产安排，相应地调整了他们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的任务。这样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充分挖掘生产潜力，就迅速地增加了生产，增加了收入。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社与社之间有许多“插花地”，妨碍土地的合理利用，妨碍大规模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和推行机械化、电气化。当时许多地方也曾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社与社间意见难于一致，一直没有办到。公社成立后，统一调整了耕地，这些矛盾便得到了比较好的处理。

第四，在坚持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发扬共产主义互助协作精神，积极地扶助穷队发展生产，使大家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原来生产条件较好、收入较高的富裕队更富裕了，原来生产条件较差、收入较低的穷队也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跟了上来。广东省在公社化初期，穷队超过四分之一，五年来穷队数量已减少了百分之三、四十，目前大约只占六分之一。在相当一部分地区，穷队数量已经所剩无几。例如花县新华公社，原有富裕生产队一百二十九个，公社成立五年来，由于进一步改善了生产条件，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连年增产增收；而在最近三年，全部都增产增收。在扶助穷队方面，五年来，该公社除从各方面对穷队加强领导外，还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积极组织队与队间的协作，并且从公共积累中提取五十九万元（占全部积累的百分之十左右）支援穷队，帮助解决生产上的困难。现在大部分穷队都搞好了生产，开始变得富裕起来；全社原有九十八个穷队，九十六个已改变了面貌。该公社东镜大队共有六百多户，过去是十年九旱，水稻亩产全年最高不超过三百斤。近几年来，公社着重帮助该队解决水利问题，接着又采取平整土地、精耕细作、改良品种、开展多种经营等项措施，生产便年年上升。五年间水稻总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一九六



三年实现了“亩产千斤大队”的计划。这个大队在一九五七年还要国家供应五十万斤稻谷，到一九六二年却向国家交售稻谷一百二十三万斤。每个社员集体分配的收入，一九六二年相当于一九五七年的二点七倍；过去有七八成农户超支，现在九成以上有盈余，全大队社员在信用社的存款达二万七千多元。由于集体收入增加，又有家庭副业作为补充，社员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社员分配的口粮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公社化以来，社员还新修了二百多间房子，购买了一百三十九辆自行车（三分之一的青壮年社员有了自行车）。东镜大队社员群众的翻身史，生动地说明了人民公社的力量。

第五，改善了一般社员的物质生活，促进了农民群众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公社化五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广大社员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南海县一个材料，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该县处在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生产条件一般还算不错，农民的生活，在广东来说也是不低的。但是，在公社化前，水利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涝灾相当频繁，一部分高田则经常受旱，生产仍然不稳定。公社化后，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经过五年的努力，在全县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动排灌网，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条件，加上积极地推广良种和改革耕作技术等，使农业生产获得大幅度增长。全县稻谷总产量一九五七年为二亿九千五百万斤，一九六三年增至五亿零三百万斤，增长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特别是一九六三年，一年之间增长稻谷一亿一千四百万斤，全县五十二万亩耕地，平均每亩增产二百斤以上。经济作物的恢复和发展也很快。副业方面，猪、鸡、鸭、鹅的饲养量都有很大发展。由于生产的发展，集体收入大大增加了，社员集体分配的金额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几近一倍。口粮水平该县一向是比较高的，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七年也增长近百分之二十。社员的购买力也大为提高，社会商品零售额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公社化后，南海县农民的生活能够在原来全省比较高的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广大农民自然是很满意的。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民公社是一种崭新的制度，它的诞生，必然会在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引起一次新的革命。农民的命运日益由人民公社所创立的强大的物质基础联结在一起了，他们依靠集体的思想更加牢固了，我们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更加巩固起来了。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同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提取了公积金和公益金，广泛地开展了生产协作活动，扶助穷队和困难户发展生产；对于少数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对于困难户，从劳动和生活的安排上，给予必要的适当的照顾，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样，就使得全公社范围的所有生产队有可能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广大社员有可能普遍过着有保障的日趋富裕的生活，从而避免小农经济条件下所不可避免的两极分化现象。所有这些，加上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加强了对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就不能不在人们的意识上产生强烈的影响。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大大加强了。现在，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的任务，已经成为公社各级领导和广大社员自觉的行动；踊跃参加民兵，协同解放



軍保卫边防，也普遍被广大男女青年视为神圣的职责。这几年来在反对美蒋特务窜扰沿海的斗争中，各地民兵都英勇地投入了战斗，立下了可歌可泣的功勋。大家依靠集体、关心集体，日益成为社会风尚。集体与集体、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共产主义精神，也一天天地发扬起来了。农民在长期的小私有制度下养成的心理和习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正在迅速地被改造着。这对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五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是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初步显示了它的无比的优越性，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可以断言，如果不是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要做好上述任何一项工作，都是困难的；还可以断言，在今后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人民公社必将进一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

三

人民公社是我国史无前例的创举，它不能不经历一个逐步完善起来的过程。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和基本方针，早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就有了明确的规定。决议指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目前仍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且指出将来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同年十二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明确指出：现阶段人民公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且详细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随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继续总结了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经验，提出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队为基础的问题，多次强调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并且针对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这就使得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制度等，都更加完善起来。五年来，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就是按照党中央这一系列的决定，及时地克服了实际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保证了人民公社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农村人民公社，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在现阶段，它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属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范畴，因而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样，继续实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经营管理方面的某些行之有效而现在仍然适用的制度和办法，例如生产责任制度、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制度等，也继承了下来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我国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切积极的、合理的因素，我们当然要继承和发扬，而不能采取否定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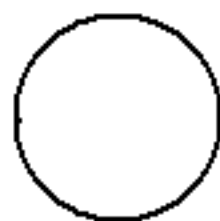
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的组织，比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它具有许多新的内容，它的组织规模扩大了，同时集体化程度也提高了。人民公社的组织，有的地方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有的地方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就是说，在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规模的生产大队之上，增加了公社一级所有制，而在生产大队之下的生产队，又作为一级所有制，并且是基本的所有制单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点，它所实行的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完善的体制，使得集体经济的人力、物力、财力较前雄厚得多了，领导力量大大加强了，这样就突破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局限性，便于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规划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便于筹集资金，安排劳动力，组织协作，举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无法办到的事情。

拿广东几年来的农田水利建设来说，如果没有人民公社比较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例如湛江专区，原是自然条件很差，自然灾害频仍的地方，五年来，这个地区的农民奋发图强，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兴建了大批水利工程，其中蓄水一亿方以上的大型水库八个，蓄水一千万方以上的中型水库四十个，灌溉万亩以上的引水工程二十五宗，总灌溉面积增长了一倍以上；如果把全部工程配套，全区农田灌溉问题便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兴建这些水利工程的总工程费（包括人工费和材料费，下同）共约六亿元，其中国家（包括专区、县）投资一亿八千万，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百分之七十左右大都是公社用组织各队协作、社员劳动的办法解决的。又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商品粮集中产区，由于地处珠江下游，经常受涝，近四年来共建成装机容量十八万一千瓩的电动排灌网，基本上解决了近六百万亩耕地的排灌问题。兴建这项排灌网的总工程费约为一亿五千万，其中中央和省投资六千余万元，其余都是各有关专区、县和公社自筹解决的。兴建较大的水利工程，有的地区受益大，有的地区受益小，并且还要淹没和占用一部分耕地，需要进行统一规划。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如果不是在公社范围内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协作，地区之间、单位之间的这种矛盾就难于解决。至于实行农业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推行技术改革，综合利用资源发展多种经营，扶助穷队发展生产，等等，也是因为发挥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才取得了显著成绩的。

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内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公社内部队与队、队与社之间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完全符合我国当前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和各生产队生产发展的状况的。我国农业的机械化还处于开始的阶段，农业生产目前还是以人力和畜力操作为主，生产队还是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就使得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与基本核算单位统一起来，有利于调动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由于各生产队在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在各生产队的发展水平尚未趋于平衡的情况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能够做到承认差别，避免平均主义。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由于实行社一级核算，由社统一分配产品，而直接组织生产的生产队，只是包产单位而不是核算单位，这就产生了分配和生产未能很好统一的不合理现象，并由此产生了队与队之间的分配不能够很好地照顾差别的问题，影响生产队和社员的积极性。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生产队曾经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的办法（“三包”即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即超产



奖励；“四固定”即固定土地、劳力、农具、耕畜），但是合理照顾队与队之间的差别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公社成立以后的前一段时间，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来得及加以解决。后来党中央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是总结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公社化初期的实践经验，既解决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就存在的问题，又解决了人民公社在前进中新产生的问题，从而使集体经济完全走上正轨，日益健康地发展起来。广东有少数公社的一些生产大队，前几年实行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效果较好，群众要求继续实行下去，经过领导批准，一直到现在还是坚持原来的制度。这几年来，绝大多数公社把生产队作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对于发展集体生产和壮大集体经济，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目前生产队的集体经济普遍较前雄厚了，公共积累增加了，增添了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有的还购置了抽水机等新式农业机械。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多数人民公社要继续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大力充实和壮大生产队集体经济上面。这是打基础的工作，绝对不容忽视。

人民公社的大队和公社两级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目前还是部分所有制，但是这两级的部分所有制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关于公社一级所有制的作用，在上面谈到的公社化五年来的伟大成就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现在根据广东的经验，讲一下生产大队一级所有制的作用。目前的生产大队规模一般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成立后，它仍然是一级所有制，作为承上启下的一级组织，作为党的基层组织——支部所在的单位，它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生产队的规模比较小，一个公社所属的生产队很多，像广东这样地方，如果没有生产大队，公社是很难进行领导的；同时，生产队由于力量所限，也需要有大队一级经常加强领导，给予具体帮助，有些必不可少的队与队间的生产协作活动，几个队联合举办的企业和事业，也需要由大队统一组织。目前生产大队和公社这两级已经拥有一定的公共积累，有了一定的队营或社营经济。这两个部分的经济目前虽然还不多，但是它们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从长远来看，它们是具有伟大前途的。随着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的充实和发展，在适当的时候，生产大队和公社这两级的积累也应当逐步有所增加，社营和队营经济也会逐步地发展起来。当然，公社和大队这两级所有的经济目前还不可能过多地发展，特别是不能用削弱生产队经济的方法去发展公社和大队这两级的经济。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这些关系，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就能迅速地发展，各级的集体经济也将会相应地增长。

现阶段多数人民公社实行的三级所有制，充分地发挥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的作用，使全公社范围的统一领导问题和充分发挥直接组织生产单位的积极性问题，都恰当地解决了，这是完全适合当前我们农村的实际情况的。将来，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以后，随着农业生产水平水平的提高，公社和大队这两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了条件具备时，人民公社将会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再经过一个时期，进一步改为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根据广东各地实践的情况看来，有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大大加强了国家对于集体經濟的政治领导和經濟领导。人民公社的社一級干部和部分大队的主要干部，既是集体經濟組織的干部，又是国家干部，这就更加有利于加强党和国家对于集体經濟的领导，使基层政权直接組織和领导生产，更好地发挥政权领导集体經濟的作用。人民公社兼备了基层政权和集体經濟組織的职能，这就既不同于人民公社化以前的基层政权机构，也不同于作为单纯經濟組織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它既要管政治，又要管經濟；既要发挥基层政权的政治动员作用，又要直接組織和领导生产；既要关心国家任务的完成，又要关心群众的生活安排。这样，党的政策就能够更好地贯彻到群众中去；同时在集体經濟内部也便于全面规划，统一安排。有了人民公社，在集体經濟和国家关系方面，可以使集体經濟的利益更好地和国家计划結合起来，有利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經濟。国家对公社举办的农田基本建設和其他事业进行投資，則有利于促进公社逐步实现农业的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

人民公社这个新的社会組織形式的出現，是我国农业继合作化后的又一个飞跃。我們的广大公社社員，正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創造自己的历史。广大农民群众創造了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組織形式，經過了五年的实践，又总结了經驗，使人民公社制度日臻完善。这就进一步地掌握了人民公社发展的規律，因而也就必然会进一步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陣地也必将进一步加强起来。

四

我国整个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是一部农村阶级斗争的历史；前一个时期組織互助組、合作社是如此，后一个时期組織人民公社同样是如此。人民公社誕生以来的五年，是充滿着阶级斗争的过程，也是不断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和改造农民的过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它初步显示的巨大优越性，它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得到了农村中广大貧农、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他們踊跃带头参加人民公社，坚决维护集体經濟利益。他們热情地歌颂人民公社，把公社看做是自己永远摆脱貧困落后的康庄大道。可是，对于被推翻了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富农来说，人民公社化运动意味着他們重过寄生生活的企图更进一步被粉碎了，他們不甘心于失败，他們中有的人采取各种办法从事破坏活动，破坏集体生产，造謠惑众，进行封建宗族活动，腐蝕和打击干部，甚至篡夺领导，企图复辟。在富裕中农中少数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也采取种种損公肥私的办法，削弱和瓦解集体經濟，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客观存在，既无法避免，也无法調和。正如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所指出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无数生动的事实证明，这个論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我国农民具有很高的革命性，他们是我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在人民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他们又积极地参加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依靠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我国胜利地实行了土地改革，接着又顺利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和农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党在农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农民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是我国工人阶级最坚定、最可靠的同盟军。我国农村实现集体化以后，我们党继续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现在有了强大的人民公社这一武器，就能够更好地加强农村的无产阶级专政，制止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滋长，在今后长时期内继续进行的“谁战胜谁”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在组织和制度上得到了更好的保证。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我国农业生产必将得到越来越迅速的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也必将越来越巩固。不仅如此，有了人民公社制度，还可以引导我国农村将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和前进方向。

当然，广大农民群众走上集体化的道路还为时尚短，他们从以往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所带来的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和习惯势力，是根深蒂固的，决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彻底改造过来的。实现合作化以后，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情况有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可是，在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程度的两重性。特别在富裕中农中，是经常产生资本主义倾向的，这种倾向有时甚至表现得相当严重。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同贫农、下中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之间，是经常存在着斗争的。必须经过很长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彻底克服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从小生产者所带来的落后倾向。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列宁说过：“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①毛泽东同志在我国解放初期就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③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证明，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大家知道，仅有先进的社会制度，而没有人的革命化，还是不行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民公社，无疑是极为优越的，但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政治思想状态；否则，即使是好的制度，也不能发挥其优越性。所以，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强调政治第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我们在整个农业集体化运动中，都把对农民的政治工作放在首要

①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5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2页。

③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3、321页。



的地位，从而坚持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地批判和克服了农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今后我们仍然必须这样做，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当作建设社会主义和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长期的战略任务，直到过渡时期结束，阶级最后消灭为止。

目前，我们正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的目的，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教育和改造农民，提高广大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强大的贫农、下中农的阶级队伍，改进干部思想作风，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揭露和粉碎阶级敌人的各种破坏阴谋，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这次运动中，必须坚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农民群众的方针，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其他中农。对于少数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上中农，必须进行教育和批评，克服他们的动摇性。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对他们实行专政，监督他们老老实实地在劳动中进行改造，把他们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对于他们当中一切真正愿意改造的人，都应当给以鼓励；但是，对于他们当中那些抗拒改造的人，必须加强管理教育，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必须坚决斗争，严肃处理。我们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日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加强，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完全可以采取这样的监督、教育和改造的政策。至于对地主、富农的子女，他们生长在剥削阶级的家庭里，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同劳动人民的子女，特别是贫农、下中农的子女是有区别的。但是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年纪较轻，没有直接参加过剥削，不是剥削分子，不能把他们同地主、富农分子一样看待，对于他们主要是加强教育和改造工作，清除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争取他们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由于我们采取了这些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凡是进行了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地方，都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贫农、下中农阶级队伍进一步加强了；广大干部提高了革命觉悟，改进了思想作风，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了。农村中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重新教育人的运动。胜利地开展这个运动，并且把这项工作长久地坚持下去，可以大大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变颜色。这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国正面临着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由于党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导，人民公社日益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农村集体经济正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五年来的实践，生动地证明了人民公社的强大生命力；今后实际生活的发展，将会更有力地证明这一点。让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奋勇前进！



花县真正变成了“花县”

張 汉 青

曾經听人說过，广东的花县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在它的老县城的北面，有一座菊花山。其实，这座菊花山，名字好听，却是滿山乱石，寸草不长，哪里能見到綽約动人的傲霜黄花呢；大概是因为山上的岩石，状似菊花，于是人們叫它菊花山吧。

花县，顾名思义，該是一个繁花錦綉，芬芳馥郁的富庶之乡。可是在解放以前，这里却是一幅田园荒蕪，民不聊生的寂寞凄涼的图画！当时的花县，不是旱，就是涝，全年水稻产量每亩不到三百斤，是省內有名的缺粮县。“天晴三日車头响，大雨一朝水浸禾。放下禾镰无米煮，一家大小泪漣漣”，就是当时花县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有許多人，因为生活所迫，离乡背井，出外謀生，甚至漂洋过海，流落異国。这里有个統計数字，着实惊人：原籍花县而現在人在国外的共有八万多人。俗語說：“穷家难舍，熟土难离。”解放前那么多花县人被迫远走他乡，顛沛流离，不正好說明花县这个地方实在穷困得难以生存下去么。

解放以后，花县的历史翻开了嶄新的一頁。在原来荒涼貧瘠的土地上，綻开了翻身之花。花县农民同全国农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推翻了封建統治，接着又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生产逐渐发展，人民生活

也日見改善。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年底实现公社化以来，五年中間，花县的面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公社之花紅似火，真个是鮮花处处，姹紫嫣紅，到处出現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花县”了。今天的花县，已經跃居全省先进县份的行列，为省內很多人所知曉。

半年多以前，我曾經到花县去过。那时全省农民的抗旱斗争正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已經六七个月未下过透雨了。人們曾經想尽一切办法，把秧苗插下去，又想尽一切办法，引水灌溉禾苗，真是一棵禾苗十滴汗啊。眼看禾苗要孕穗了，天依然不下雨，驕阳似火，風吹在臉上滾燙滾燙的。可是我們走在花县的田野上，除了看見极少数田块較高地方的禾苗被烈日烤得枯焦以外，到处都是一片葱綠，那样整齐，那样生气勃勃。同行的一位同志滿怀高兴地說：“你們說什么最美？这么大片的整齐的禾苗，最美了。人們常說錦綉河山，花县农民在大旱之年‘綉’的这些禾苗，真正为祖国河山增色不少！”

是啊，花县人究竟靠了什么法宝，使得这大旱之年，能够旱天不早地呢？

这半年来，我又几次到花县去。所見所聞，完全回答了这个问题。一句話：因为有了人民公社。



花县的水利条件原是很差的。东北部地势高，常年闹旱，西南部上地低洼，容易内涝。广大农民群众长期以来就期望着改变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农业生产能够稳定保收。可是要做到这样，多么不容易啊！在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以后，花县人民依靠集体的力量，开始了改造自然的进军，兴修了一批水利，计有较大的水库一个，小型引水工程一宗，还有一批山塘、水井。这些水利工程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可是距离根本改变恶劣的自然条件还很远。全县三十多万亩水田，在一九五七年以前，水利条件较好的不到十万亩，因旱涝灾害频繁，每年都有三万多亩稻田有种无收。当时，就有几十个农业社想修筑县东南部的流溪河引水工程，解决东部地区的干旱。可是由于农业社力量还不够强大，加上单位多，有些问题不好解决，没有很好地修筑起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县建立起六个人民公社。原来分散的农业社，联合起来了，人们深深感觉到人民公社的巨大力量了。长期蕴藏在群众心里的征服大自然的愿望，使他们那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干劲更大了，信心更足了。于是，在一九五八年冬天，一项规模巨大的改造河山的工程开始了。各公社共组织了四万个劳动力，迎着朔风，冒着严寒，奋战了三个月，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把这项横贯全县东西的大型引水工程修筑起来。长达三十多米的大坝，把流溪河拦腰截断，流溪河的水位升高了，清清的河水通过纵横交错的渠道，流到干旱的田里，解决了将近十三万亩稻田的灌溉。这项工程，东西穿过几十座山头，跨过十多条溪流，共修建大坝、船闸、水闸等

大小建筑物一千三百多座。这是花县人民引以自豪的一桩大事。每个公社社员，只要谈起流溪河引水工程，就会谈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一股豪情和喜悦，溢于言表。

人民公社改造自然的战斗，当然不止这一项。公社化后，每年冬春，都有几万个劳动力有组织有计划地兴修水利，修水库，筑山塘，建堤围，挖水井，还在西南部低洼地区兴建了一批电动排灌站。所有这些，就是一个普通的公社社员，也会如数家珍一般地、一桩桩地向你叙述。除流溪河引水工程外，像受益三万五千亩的芙蓉潭水库，受益二万亩的洪秀全水库和福源水水库，受益一万亩的集益水库和新庄水库，四十四座电动排灌站（装机容量八千瓩），长达八十多公里的防洪堤围等等，都是在人民公社的年代里诞生的。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奋斗，全县已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排灌网，使有保证的灌溉面积达到全部稻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社员再不愁早年没有水灌溉了。公社化后水利条件的大变样，使得社员深深地认识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无限地热爱人民公社。

我在新华公社听到一个故事，说的是团结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曾相的事。从这个人的亲身经历，可以说明花县水利面貌的变化。在互助合作运动开展前的单干时期，大家耕种的都是没有灌溉保证的所谓“望天田”，要是碰上旱灾，简直毫无办法。曾相一家劳动力少，抗旱时，只有他一个人车水，因力气不够，只好背上一块大石头，站到脚踏水车上，去车水，以增加身体的重量。等到勉强灌满了两亩地，背脊也磨破了皮。办起农业社以后，修了一些水利，合作社人手也较多，磨



破背脊的罪可以不受了，可是碰上旱年，車水也要車得脚底起泡，而庄稼还不能完全保住。现在，有了人民公社，水利条件大变样了，他们队大部分耕地，都可以自流灌溉。由于公社可以在更大范围内统一领导，过去长期存在的用水矛盾也得到解决了。新华公社东镜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黄巨平，对此深有感触。他说：“东镜离水源最远，慢说过去未修流溪河引水渠道，就算有渠道，放水也轮不到我们，遇到干旱也只好眼巴巴看着禾苗被晒干，晒死。如今不同了，大旱年也有水流到东镜来。没有人民公社，哪能办得到！”这个老汉的一席话，饱含昔日的辛酸，也充满今天的欢乐。至于洪水和涝灾，对于花县来说，也昔时今日，大不相同了。碰上一般大洪水，能够保卫人、畜和村庄的安全，并使农作物正常生长。

由于水利问题解决了，这就改善了最重要的一个生产条件，为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创造了新的条件。这几年，花县各人民公社在水利条件改善的同时，抓紧了推广良种、改良土壤、增施肥料、合理排灌等措施，农业生产年年上升。一九六三年早造虽然遭到六十年未遇的大旱，但稻谷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许多社员都说：“要是在解放前，碰上这种大灾害，连命都保不住，现在照样吃三餐干饭，人民公社真是铁饭碗！”全县稻谷生产，连同高级社时期的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在内，到一九六三年为止，连续七年十四造获得增产。全年稻谷平均亩产量从一九五六年的三百九十二斤增至一九六三年的八百六十七斤，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一；总产量从一亿四千五百三十七万斤增至三亿

零三百五十一万斤，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九。由于水利有了保证，近几年来水稻产量在连年增产的基础上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一九六二年比一九六一年增产百分之十三点五，一九六三年又比一九六二年增产百分之十七点三。这个县在解放初期根本没有能力向国家提供商品粮食，自然灾害严重的年头还要国家供应粮食，合作化时期向国家交售的粮食也很少，而一九六三年度交售给国家的稻谷共有一亿一千万斤。花县是一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三十多万亩稻田的小县，能够向国家提供这样多商品粮食，这是公社化前所无法办到的。副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猪、鸡、鹅、鸭的饲养量，五年间增长一倍以上。全县农副业总产值，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由于生产迅速发展，社员的集体分配收入在五年间增长一倍；社员的购买力大大提高了，社会商品零售额五年间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自行车、缝纫机、暖水瓶、坐钟等商品，更是几倍、几十倍地增长。

有人说：“真没有想到，鸡窝里飞出了凤凰。”这话是指花县的变化来说的。花县五年来的变化，确实是惊人的。但是，这些奇迹的出现，不是靠大自然的帮忙，而是靠党的领导，靠人民公社的力量，靠广大社员要求彻底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志气和毅力。

这几年，大自然不仅没有能够帮什么忙，反而带来了两次严重灾害。一九五九年六月发生一场大水灾，一连下了五天大雨，低洼的地方都受淹了。咆哮的洪水，冲决了一些堤围，冲垮了部分房屋，吞噬了大片庄稼。但是，它摧毁不了广大社员的坚强意志。在人民公



社的统一领导下，各方协作，互相支援，花县农民克服了洪水带来的巨大困难，及时地把受洪水威胁的人家转移到安全地带，洪水过后又千方百计排除积水，抢救禾苗，力争减少损失。没有受灾的地方则大力开展增产运动。结果，全县大多数地方早造仍然获得增产。到了晚造，虽然又碰上旱灾，但全县公社社员热烈响应中共广东省委提出的向大自然夺回因洪水损失的粮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灾增产运动，又获得了较好的收成。这一年，全县稻谷生产比上年仍然增产百分之六点五。

一九六三年的特大旱灾，同样没有使花县的社员屈服。几年来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在抗旱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次抗旱斗争中，人民公社加强了领导，合理安排用水，并且组织队与队、社与社间的支援和协作，从而大大地加强了抗旱的力量。赤坭公社西边村电动排灌站，负责灌溉五个大队的一万多亩稻田，最远的相距七八公里，由于公社统一领导，合理安排，使上下游的大队都有水抗旱。花东公社李溪等十二个旱情较轻的大队，组织一部分人力帮助联安等旱情严重的大队打水井二百五十多口，还帮助整田抢插，使联安等大队按时完成插秧计划。新华公社在旱情严重发展、水库蓄水放下的紧要关头，公社党委当机立断，按照互相帮助、等价交换的原则，发动三千多人兴建巴江河的“西水东调”工程，挖了一条长达十多华里的渠道，运用三级动力接力，一级一级地把水抽上来，迫使河水流到高出巴江河面十五米的官溪、九潭、三华等严重干旱地区，挽救了一万多亩正在孕穗的禾苗免于枯死。社员们十分感动，

纷纷说：“梦想不到河水能倒流”。

说到人民公社统一领导的优越性，炭步公社党委书记汤宝佳同志对我讲的两件事，在我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社化前，一九五六年，花县撤销了区，小乡并大乡，当时炭步区分为炭步、石湖、大窝三个大乡。那年早造，炭步乡一带突然下了一场滂沱暴雨，内涝成灾。若按地势来说，应当设法让水从大窝乡排出去。可是，他们在单造田（只在下半年雨水较少时才插秧的稻田）里养上了鱼，无论如何不肯把田里的鱼捉起来，让洪水通过该处排出去，结果炭步乡有三千四百多亩禾苗受淹，严重减产。汤宝佳同志说，要是现在发生了这种事，那是很容易协商解决的。接着他又举了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春骆村和鸭湖两个大队修筑大堤围的例子，为了使堤围早日修好，公社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动员了其他大队派人支援，只花了一个月零七天就修好了；如果单靠这两个大队自己的力量，三年也修不起来。汤宝佳同志说：“要是没有公社，想办这么一件‘小事’，也不知要费多少唇舌，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呢。”

作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的经济实力比高级社要雄厚得多。这是花县在公社化后能够兴修大批水利，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以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兴办的工业企业来说，就有农具厂、农药厂、石灰厂、种苗场、煤炭厂、建筑材料厂等，五年来共提供了一千九百多万元的积累。其中将近百分之七十用于农田基本建设、购买拖拉机、抗灾、支援穷队、举办公共福利事业等。五年来全县农田



水利建設投資（人工費不在內）共達一千一百九十四萬元，其中由社、隊自籌的占一半左右。一九六三年購買抗旱工具的資金，絕大部分也是由各社、隊自己解決的，大大減輕了國家的負擔。目前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正在日益充實和發展。集體積累增加了，物質基礎逐漸雄厚了。根據花東公社高溪大隊第四（代表中等的）、第七（代表好的）兩個生產隊的典型調查，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生產連年上升，收入逐年增加，歷年純收入平均增長百分之四十以上。第四隊在三年間購置了耕牛兩頭，谷籬一百二十担，抽水機一部；第七隊購置了耕牛七頭，谷籬四十担，抽水機一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越發展，它所發揮的作用也必將越來越大。

在花縣，隨着征服自然的偉大勝利，花縣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大大改觀了，一批一批新的農民被培養出來了。廣大社員衷心地熱愛黨，高舉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旗幟。他們依靠集體的思想更加牢固了。雖然農村的一些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等階級敵人不甘心滅亡，曾經想盡花樣破壞人民公社，有少數富裕中農也企圖用各種損公肥私的辦法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廣大貧農、下中農堅定不移地維護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人民公社的旗幟越舉越高。

我曾經訪問過新華公社東鏡大隊。這是一個近兩年才摘掉“窮隊”帽子的大隊。“有女不嫁東鏡村”，這是解放前遠近人們所熟知的一句話。解放前這裏的自然條件極差，十年九旱，產量很低。公社化以前，這裏的生產面貌還未顯著改變，因此，群眾信心不大，有些人說：“要改變東鏡面貌除非太陽從

兩邊出來”。公社化後，在公社支援下，修好了水利，從此面貌大變。一九六三年早造的稻穀產量，就相當於高級社時全年產量的兩倍左右。社員從集體分配的收入，在縣內也名列前茅。太陽依舊每天從東方升起，但東鏡的社員卻完全換了一付面容，個個都迎著人民公社的太陽在歡笑。他們現在的說法是：“人民公社像太陽，照亮了東鏡的人心，也照亮了東鏡的前途。”

常言道：花香千里引人來。這幾年，花縣的人民公社吸引了來自國內外的許多“賞花者”。這件事，且不說它。在中共花縣縣委，有一個幹部告訴我另外兩件事：其一是解放前因生活沒有保障而到南海、中山、廣州尋找活路的人，這幾年陸續回來了一大批；其二是過去有些類似東鏡那樣特別困難的地區，女子想盡辦法嫁出去，別處的女子又不肯嫁進來。現在不同了，不要說本縣的女子高高兴兴地嫁過來，就是毗鄰的從化、南海、清遠等縣的女子，也心甘情願地嫁到花縣了。他說得那麼興高采烈，使聽的人也笑將起來。

是的，從有文字記載以來，哪一個時期，哪一個朝代，能夠像公社化以來這樣，創造了这么多的奇蹟！但是，這還僅僅是五個年頭。現在，花縣的人民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毛澤東同志說：“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一付奴隸相麼？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面的勞動人民，現在真正開始統治這塊地方了。”^①花縣二十多萬公社社員，完全做了自己命運的主人。他們正在繼續前進。

① 《介紹一個合作社》。《紅旗》1958年第1期。



“四个第一”的辩证法

· 郭力军 ·

革命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是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按照这个规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就是说，每一个事物内部都有矛盾。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做革命工作，特别是做领导工作，观察和处理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揭露矛盾，分析矛盾，正确解决矛盾。不过有的人是自觉地这样做，有的人则不自觉地。只有把唯物辩证法自觉地应用于实际工作，才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或做得好上加好。

林彪同志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的指示和人民解放军的实际情况，为了进一步明确新的历史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提出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和正确处理这四个关系的“四个第一”的思想。

“四个第一”的思想就是：在处理人和武器的关系中，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在处理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的关系中，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在政治工作中，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在思想工作中，把抓活思想放在第一位。这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也是军队建设的方向。

林彪同志提出的这四个关系和“四个第一”的思想，是自觉地运用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精辟地阐明和创造性地发展了的矛盾规律的学说，来揭露、分析和解决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中的矛盾，从而使工作做得更加出色、更加成效显著。

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中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如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工作内部的矛盾，以及上下级之间的矛盾，兄弟单位之间的矛盾，军民之间的矛盾，等等。这就是说，军队工作中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四个第一”不是军队工作中各种矛盾的现象罗列，而是正确处理其中的四个重要的矛盾。这四个矛盾就是：人和武器的矛盾，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的矛盾，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和其他事务性工作的矛盾，思想工作中抓活思想和进行书本教育的矛盾。这些矛盾，一个套一个，一环



扣一环，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人和武器的关系，是矛盾统一的关系。首先，人对武器有依赖关系，没有武器是不能最后战胜敌人的；人的作用必须通过武器、借助于武器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但武器是要人去制造、去使用的；人是活的，武器是死的；没有人去使用或使用不当，再好的武器也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说，在人和武器的矛盾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毛泽东同志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①他又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②

人的因素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个真理，在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固然适用，在科学技术大大发展的现代，也仍然适用。技术越发展、越进步，对人的要求也就越高，人的作用也就越显得重要。远程武器和核武器的出现，对战争的进程当然会有重大的影响，但决不可能改变战争胜负的基本规律。战争的最后结局，归根到底要看人的作用，要看人的勇敢、觉悟和牺牲精神，看谁能过得硬。“人的因素第一”的思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既适用于战争，也适用于我们的一切工作。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物质条件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人，是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精神，是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证明，不论是在军队工作或地方各项工作中，凡是重视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坚持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善于把苦干和巧干结合起来、把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都能充分发挥物质条件的作用，克服物质条件方面的各种困难，在工作中取得显著的成效。反之，物质条件再好，如果缺乏正确的领导，见物不见人，不能充分调动人的革命积极性和发扬人的革命精神，或者没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工作就没有生气，打不开局面，做不出显著的成绩，甚至把事情办坏，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所以说，无论是军队在处理人和武器的关系中，或者是地方各个工作部门在处理人和物的关系中，都必须把人的因素摆在第一位。

正因为人的因素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所以做人的工作就是军队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的工作。政治工作主要的就是做人的工作，即做人的革命化的工作。政治是统帅，是灵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59页。

②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16页。



魂。政治工作是解放军的生命线。解放军的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本质，它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大威力的来源，就在于它有党的领导，有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党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军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而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领导和保证军队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要是没有或者削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军队的建设和作战就会根本没有或者迷失方向，军队的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本质就根本不可能，或者要受到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就失去了最根本的保证。所以加强政治工作，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乃是军队工作中的首要的工作。

政治工作不但是军队的生命线，也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生命线。只要把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觉悟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起来了，一切工作的胜利就有了根本的保证。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① 思想工作 and 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

由此可见，无论是解放军数十年来建军和作战的经验，或地方工作同志领导生产建设和阶级斗争的经验，都证明：在处理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的关系中，必须把政治工作摆在第一位。

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提高人的因素、政治思想因素在战争和一切革命及建设工作中的作用，并通过人而充分发挥武器在战争中和其他物质条件在各项工作中的作用。唯其如此，所以政治工作又必须以思想工作为主要内容，以做好人的思想工作为基本任务。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下，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水平如何，就决定工作的水平和结果如何。正确的思想，是工作成功的条件；不正确的思想，是工作失败的根源。从来没有思想错误而能有正确的行动和成功的实践。战争是如此，一切革命和建设的工作也都是如此。

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说，要抓思想工作，要把思想动态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来抓。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毛泽东同志亲手写的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在我们的军队中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一九六〇年十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精神，是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在军队建设新时期的继续和创造性的发展。

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最基本的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部队，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提高全体人员的无产阶级觉悟，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兴无灭资的斗争。只要这

^① 《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页。



一点做得好，其他各种工作也就可以做好了。

做好思想工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首要前提，政治工作必须以思想工作为主。换句话说，在处理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和其他事务性工作的关系问题上，必须把思想工作摆在第一位。

思想工作也有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是进行书本教育和抓活的思想两个方面。学习书本理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对于改造和提高人的思想，对于做好工作，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轻视书本，不认真地读书是不对的，但重要的是抓活的思想，进行书本教育要同实际相结合。军队有什么问题，中央有什么政策，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如何，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上所没有的。我们必须以实际为中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领会这些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军队的每个时期所存在的问题。思想工作要反映实际，要按实际情况去进行工作，这是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透彻地说明了这些问题。我们做思想工作，主要是做好活的思想工作，要善于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来回答各种现实问题，必须学会及时掌握群众生活的脉搏，掌握群众思想变化的规律，从实际出发去进行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泛泛地去做，不能停留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停留在书本理论教育上，也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政治思想教育上，而必须深入地、具体地做到每个人的现实思想上。否则就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

应该这样说：把思想工作深入地、具体地做到每一个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每个人的现实思想问题，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中开花结果，这才是检验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否做到了家、是否真正发挥了它应当发挥的威力的根本标准。政治思想工作如果不去抓或抓不住活的思想，不落实到解决人们的活的思想、现实思想问题上来，那是不会有效果的。

这样一来，从人和武器的矛盾出发，便引伸出其他三个矛盾，即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的矛盾，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和其他事务性工作的矛盾，思想工作中抓活的思想 and 进行书本教育的矛盾。从人的因素第一出发，又引伸出其他“三个第一”，即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样一来，“四个关系”和“四个第一”便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的体系，成了军队长期以来政治工作经验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和系统化，它反映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最一般的规律，反映了军队政治工作本身固有的辩证法。

从解放军正确处理军队工作中上述四个关系，紧紧掌握“四个第一”的思想的范例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关系复杂的事物，当它内部存在许多矛盾的时候，不但要找出其中重要的矛



盾，而且要分清每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对于实际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林彪同志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的指示和军队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四个关系”和“四个第一”，正确地指出了军队政治工作中必须经常注意掌握的四个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分清了各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把做人的工作、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和抓活的思想放在第一位。这样一来，军队政治工作的本质一下子就被抓住了，它的最一般的规律就揭示得更加清楚了，因而，它的方向就更加明确了，方法也更加对头了。这就保证了我们军队坚定地沿着革命化和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前进。

军委和林彪同志分析和解决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方法，概括地说来，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的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方法，亦即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性，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①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的精神，军委和林彪同志在分析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时，完全是采取客观地、全面地和深入地看问题的科学方法。其所以是客观地看问题，就是从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像出发。其所以是全面地看问题，就是在分析各个矛盾的特殊性时，关照了矛盾的总体、矛盾的相互联结，而不是孤零零地提出和解决其中的一个矛盾。其所以是深入地看问题，就是没有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是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并且是按照事物本身固有的内部联系，从一个问题推论到另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从一层本质深入到另一层本质、再一层本质、又一层本质。这种层层剥皮、层层深入的分析方法，表现了活生生的辩证法。

人和武器这个矛盾的提出及其正确解决（“人的因素第一”），对于军队建设工作无疑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它还没有回答究竟应当怎样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这个问题，还没有进一步回答军队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涉及到另外一个矛盾，即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提出及其正确解决（“政治工作第一”），就接触到了怎样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这个问题，做人的工作即政治工作在整个军队工作中的地位问题。但是，这也还没有回答应当怎样加强政治工作的问题，还不知道应当从哪里着手去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00—301页。



加强政治工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揭示政治工作本身的矛盾。因此，又指出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和其他事务性工作的矛盾，并提出“思想工作第一”作为正确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这样一来，就揭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本质，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但是，如果就到此为止，问题仍然存在：到底应当如何加强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又应当从哪儿突破口子呢？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揭露思想工作本身的矛盾。因此，最后，就进一步指出思想工作中抓活的思想 and 进行书本教育的矛盾，并提出“活的思想第一”作为正确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的政治工作就不但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而且有了更加落实的办法。

不难看出，这种层层深入、一贯到底的分析方法，对于充分暴露事物的本质，从而科学地规定工作的方针、方法，有着何等重大的意义。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是既唯物又辩证的方法；客观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是怎样的，就怎样去认识它，而不带任何主观随意性。这种科学的分析方法，与那种随便想到几个什么问题，随便加以推论，随便得出什么结论，就拿去指导工作的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根本不相容的。用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去认识问题和指导工作，是没有不犯错误的。

解放军在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中贯彻“四个第一”的思想，是党和毛泽东同志对军队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军队坚决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的结果，是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在军队建设新时期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它使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和非常战斗化的军队。

“四个第一”的思想，不但是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的方向，对于全国各项工作来说，都具有普遍意义。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学习解放军这种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一贯重视政治工作、坚决贯彻“四个第一”的经验。这是一个伟大的学习运动，它将把全国各个战线上的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起来，把人们的革命精神更加发扬起来，迎接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的新高潮。

有些人认为，要是主张人的因素第一、政治思想因素第一，就是不承认物质因素的决定作用，就是违反了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误解或曲解。

辩证唯物主义当然承认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承认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原理。但它并不停留在这点上，它不是把意识对物质的关系简单地、消极地理解为仅仅是一种依赖关系，而是在承认这种依赖关系的前提下，同时承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在辩证唯物主义看



来，不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也可以变成物质。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①物质和精神的对立，只有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即哪是第一性和哪是第二性这个意义上，才是绝对的。列宁又说：“这种对立不应当是‘无限的’、夸大的、形而上学的，这是不容争辩的……。如果在这些界限之外，把物质和精神即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当作绝对的对立，那就是极大的错误。”^②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来说，第一性的东西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第一等重要的东西，而第二性的东西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第二等重要的东西。

客观物质条件，当然是重要的。但客观物质条件是要人去利用的，人不去利用它或不善于利用它，再好的客观条件也无济于事。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又是最重要的。如果根本否认客观物质条件的重要性，不承认它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客观物质基础，认为战争或其他一切事业成败的可能性都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意志，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在认识上会导致主观唯心主义，在实践上则会导致冒险主义。反之，如果看不到意识的反作用，不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变客观可能性为现实性的决定因素，那也同样是错误的。这在认识上会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则会导致右倾机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我们的“四个第一”与这两种错误思想没有任何相同之点，它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我们从来不低估、当然更不否认武器及其他物质条件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客观物质基础。但要把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决定性的东西是人们的主观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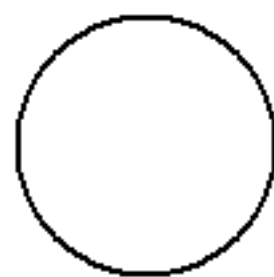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③他又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④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既说明了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各有其不同的重要性，又突出地强调了主观因素对于实现客观可能性的决定作用，是辩证地解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的典范。

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一个共同的主要缺点，就在于机械地和片面地理解物质和意识的关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8页。

②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8页。

③④ 《論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6、468页。



系，只看到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而看不到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结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主观能动的方面，就由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旧唯物主义的这个缺点，使它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不能彻底战胜唯心主义，终于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更高级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

在出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再倒退到旧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以之对抗辩证唯物主义，就只能是一种哲学上的反动。那些坚决反对人的因素、政治思想的因素是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而认定“战争中的‘强’与‘弱’，应当看作是物质因素，而不是精神因素”的人，他们的错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就在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泥坑。他们的这种“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颖的东西，无非是那早已破产的“唯武器论”的翻版，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战争问题上的反映。毛泽东同志说：“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①他又说：“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②

资产阶级“唯武器论”的思想，见物不见人的思想，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很唯物的，其实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于社会历史的领域，不理解“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这也是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共同特点，共同命运。

非常明显，反对见物不见人、反对“唯武器论”和“技术决定论”等思想的斗争，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中正确解决四个关系问题，坚决贯彻“四个第一”的思想，正是由于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坚决捍卫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结果，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把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宝贵经验在全国范围推广，在全国一切工作中坚决贯彻“四个第一”，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精神，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1134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9页。

③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31页。



哲学研究要面向当前革命斗争

关 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它是在千百万革命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吸取营养而不断得到发展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必须密切联系当前革命斗争中活学活用，“有的放矢”，运用它的基本原理说明和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有生气勃勃的哲学宣传工作和哲学研究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永远是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的科学，它绝不构造“结束真理”的形而上学体系，它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①；它充分意识到认识（包括哲学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必须为实践服务，在革命的实践斗争中不断地向前发展；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哲学，能够永远保持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正因为这样，所以，它能够永远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伟大的生命力，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是活的哲学。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却也有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或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他们

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同实践的联系，把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脱离时代精神的死的哲学。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上，哲学工作队伍也不可避免地要一分为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死的哲学，并且在战斗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生命力，就是通过这样的战斗而得到保持和发扬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这样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当着把自己死死地关在书斋里，当着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同革命实践脱离的时候，就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变成死的教条。这样，尽管把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背得烂熟，却不可能做出什么理论上的贡献。

哲学工作者应当怎样进行工作，才能在理论上做出贡献呢？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科学地解决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84页。



了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对文学艺术的源和流作了最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阐述。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哲学，对于哲学研究工作，也是完全适用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书本上的东西，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所以继承文学遗产虽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造”。因此，“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入，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①

哲学工作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呢？毫无疑问，也应该这样。

在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同样存在着哲学原料的矿藏，这是哲学的唯一源泉。书本上的哲学知识，是流而不是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革命实践。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的指南，是我们哲学工作者开掘哲学原料的矿藏、加以冶炼和制造成品的

锐利工具。我们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的哲学结论，来代替对于活生生的、新冒出来的事物的研究。至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则只能是我们哲学上“推陈出新”的思想资料、知识资料。因此，我们哲学工作者也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掌握原始材料，然后进入创作过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分析它、概括它，写出为当前革命斗争服务的哲学作品。对于哲学史工作者来说，固然在专业上有分工，但是也应该密切联系革命实践，立足于当代。这样，哲学史的研究工作，才能提供为解决当前革命实践问题所需要的、经过分析和批判的思想资料、知识资料，才能真正做到“推陈出新”，写出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史。

我们哲学工作者，切不可把哲学的源和流的关系，弄颠倒了。

如果把哲学研究工作同哲学原料的矿藏分开，也就是割断了哲学同革命实践的联系，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把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死的哲学。

哲学家的头脑，好比加工工厂。如果脱离实践，脱离哲学原料的矿藏，一味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那就如同工厂生产上没有原料而开空车一样。生产上没有原料开空车，绝不可能造出什么成品，而只能磨损机器。哲学研究工作没有原料而开空车，就不会写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2页。



出什么有益的东西来，并且会把自己的脑筋变死，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

哲学工作者固然应该认真读书。但是，应该如毛泽东同志教导的那样，要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读书，读书的目的应该不是为了掌握武器，用以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①他又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活学活用，用来说明革命中的实际问题；学习历史和其他文化知识也必须活学活用，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助于说明当前革命中的实际问题。采取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去读书，就会使人变得聪明。如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攻圣贤书”，就会使人变成书呆子，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知識就学不到，而在自己脑筋里把它们变成一堆死的东西。

把哲学工作同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割断了联系，就是违背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陷入了唯心主义。如果那样，要做通俗化的工作，也决不可能做好，因为：第一，不懂得群众的語言，写出来的东西人家看不懂；第二，不

了解广大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需要什么，写出来的东西和当前革命实践不对口径，人家不感兴趣；第三，学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一通俗化就要走样子。如果那样，要做研究工作，就只能从概念到概念，不着边际地发空論，凭空地去发明范畴、創造規律，写出害人害事的“死哲学”。

走出书斋，面向当前革命斗争，到实际工作中抓活哲学，这是哲学工作的一个根本方向问题。

在我们国家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正在深入展开。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发扬。新入新事、新道德、新风尚和新经验，如雨后春笋般地到处出现。广大干部和群众意气风发，做着史无前例的事业，创造出了许许多多书本上没有的新东西。它为活跃我们的哲学宣传工作和哲学研究工作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要担負者——广大干部和群众，一方面迫切地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用以解决他们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一方面以自己的行动创造了崭新的哲学原料，提供了哲学研究工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哲学工作者应该首先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学习他们的生动语言，从而写出通俗化的哲学作品，把哲学交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且总结和概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①②}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817页。



义建设的新经验，说明新事物、新问题，丰富马列主义哲学。就是说，我们应该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按着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认识论原则，进行哲学的宣传工作和研究工作。

在我们国家里，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文化战线上是一片蓬蓬勃勃的气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踏步前进，必然引起哲学的宣传工作和研究工作大踏步前进。这是一个普及和发展马列主义哲学的大好时代。问题是，我们哲学工作者不要脱离自己的时代，辜负自己的时代；而要

面向当前的革命斗争，密切联系实际。这样就能写出好的作品，为自己的时代服务，扩大马列主义哲学的阵地，发展马列主义哲学。

第一，我们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第二，我们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的极为丰富的哲学原料；第三，从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以来，许多哲学工作者在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正确方向下，从事哲学的宣传工作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许多经验。有了这样三条，哲学工作者只要面向当前革命斗争，就一定能够做出可观的成绩来。

学会“一分为二”的方法

卢 国 英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①。“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②

这是列宁在论述辩证法时的十分精彩、十分重要的话。这些话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最根本的东西。

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极其深刻地透彻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

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③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0页。

②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7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2页。



的問題》中，又強調指出：“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毛澤東同志這些話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這就是要我們在一切工作中，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學說，用一分為二的方法，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兩點論”，來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用一分為二的方法來觀察和處理問題呢？這是因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本身都是一分為二的。所謂一分為二，就是每個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的兩方面，這兩方面既統一又鬥爭。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真理和錯誤、革新和守舊、先進和落后、成績和缺點等等，一方面與另一方面是相互聯繫而又相互對立的。世界上找不出沒有矛盾的事物。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充滿着矛盾。

恩格斯曾經說過：“所謂客觀辯證法是支配着整個自然界的，而所謂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在整個自然界中到處盛行着的由於對立而產生的運動的反映而已”^①。既然客觀事物存在着矛盾，統一物分為兩個部分，這就要求我們在觀察事物和分析問題的時候，必須採取一分為二的辯證方法，努力去認識和把握客觀事物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聯繫。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所以具有無比威力，就在於它是客觀辯證法的真實反映，揭示了客觀事物的根本規律。我們只有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來觀察事物，才能對事

物獲得正確的認識。

如果不用一分為二的方法，而採取“一點論”的方法來看問題，那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形而上學否認統一的事物中存在着兩個互相聯繫而又互相對立的部分，它總是孤立地把事物的某一方面推崇為絕對，把片面當作全面。用這種思想方法來看問題，就是只了解一方，而不了解另一方；只見局部，不見全體；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正像人們常說的瞎子摸象的故事一樣，瞎子摸到了象腿，就說象像個柱子；摸到象耳朵，就說象像把蒲扇。按照形而上學的方法看問題，就必然歪曲地反映客觀實際，必然導致主觀和客觀相分裂的主觀主義。

用一分為二的方法來分析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善於發現和揭露工作中的矛盾，把握對立面，既要看到這一面，又要看到那一面，既要看到先進，又要看到落后，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等等；並分析這兩方面的情況，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我們的工作和一切事物一樣，都是可以分析的。只有成績而無缺點，或者只有缺點而無成績，對於革命工作說來，都是沒有的。用一分為二的方法來分析我們工作的时候，特別要注意的是：當我們工作取得成績、處於先進狀態的時候，要善於發現薄弱環節和不足的地方；當我們的工作存在着很多缺點、處於落后狀態的時候，固然要嚴肅地對待缺點，克服缺

^① 《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4頁。



点，但还要善于看到积极因素。要做到这些，只有用革命的辩证法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才能使我们的头脑经常保持清醒，才能使我们的工作不断前进。

事实证明，那些比学赶帮搞得好的地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他们把自己的工作一分为二，既看到自己的成绩，又看到自己的缺点，同先进单位作比较，发现差距，向先进学习，采取有力的措施，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改变了自己的落后状态。

很多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的事例也表明，只要对自己的工作不满足于现状，看到天外还有天，也总可以发现薄弱环节，也需要向人家学习。就工业交通系统来说，上海是一个先进的地区，但是，上海工业交通系统的同志并没有觉得他们的工作尽善尽美、白璧无瑕，他们以清醒的头脑，既正确地估计了自己的成绩，又寻找出自己不如别人的许多薄弱环节。上海的工厂企业也派出大批职工分赴外地“取经”，力争更上一层楼，先进更先进。

一切事物，包括我们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的工作等等，都是由矛盾着的对立面构成的，总是作为矛盾的过程而向前发展的。不仅各单位之间，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有单位之间的对立面，而且本单位内部也有这种对立面。先进单位中有落后因素和薄弱环节，在落后单位中有积极因素和成绩。正因为这样，我们对本地本单位和别地

别单位的工作，都要作具体分析。

我们说先进中有落后和落后中有先进，并不是把先进单位中的先进方面和落后因素方面等同起来，也不是把落后单位中的落后方面和先进因素方面等同起来。客观事物的矛盾两方面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它们有主次之分。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我们说这个单位是先进单位，就是因为这个单位和其他单位相比较，它的好思想、好经验、好方法、好作风占了主要的地位；我们说这个单位是落后单位，就是这个单位和其他单位相比较，它的好思想、好经验、好方法、好作风不那么突出，或者是落后的东西占了主要地位。如果按照形而上学的折衷主义观点，把先进单位中的先进方面和落后因素方面同等看待，把落后单位中的落后方面和先进因素方面同等看待，那就没有什么先进单位和落后单位的区别了。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所要求的，是在把统一的事物一分为二的时候，必须认识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主次关系，而不能把它们看作半斤八两，并列起来。

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要求在分清矛盾双方的主次关系的同时，还要求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着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矛盾双方的不断转化来实现的。例如，先进和落后、成绩和缺点、好事和坏事，这些矛盾着



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都会向相反的方面轉化。如果有人以为自己先进了,有了很大成績,就沾沾自喜、驕傲自滿、固步自封起来,那就会給工作造成重大損失,使先进轉化为落后。如果我們的工作处于落后状态,但能正視它,重視它,揭露它,分析原因,吸取教訓,那末,落后就会轉化为先进。这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結果。”^①

認識事物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轉化,这对于我們实际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澤东同志指出:“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够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我們看問題,最忌絕對化,最忌把事情看死。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分析我們的工作,就不仅要看到这方面和那方面,看到这两方面哪是主要的,哪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自觉地运用矛盾轉化的規律,不使好的方面轉化为坏的方面,而使坏的方面轉化为好的方面。如果我們的工作居于先进地位,那当然是好事,但同时应当看到工作中的缺点和薄弱环节,看到在一定条件下先进有轉化为落后的可能。所以,我們就要認真巩固成績,克服缺点,要在薄弱环节方面加強工作,特別要兢兢业业、勤勤懇懇、謙虛謹慎,防止产生驕傲自滿的情緒,哪怕它是萌芽性的东西,一旦暴露出来,就

要坚决地把它消灭于萌芽状态中。这样,就可以防止先进轉化为落后,而使先进更先进,使我們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如果我們的工作居于落后地位,那当然是坏事。但同时我們应当看到工作中的积极因素和成績,看到在一定条件下落后有轉化为先进的可能。所以,就不应当悲观失望、自卑自餒,而要树立信心、鼓足勇气,寻找并創造由落后轉化为先进的有利条件,发揚工作中的积极因素,发揚苦干巧干的革命精神,用一切办法,一步一步地消灭落后状态,使之轉化为先进。

事物为什么会相互轉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呢?这是因为矛盾着的两方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的緣故。事物內部矛盾着的两方,互相联系、相互統一,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存于一个統一体中;同时它們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彼此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是絕對的,无条件的;而統一相对的,有条件的。

去年,上海的协昌、第一、惠工和远东四家縫紉机厂你追我赶、我学你帮的竞赛,是說明这个問題的一个很生动的实例。过去評比产品质量时,协昌和第一两厂常常領先,而惠工和远东两厂則常常处于落后状态。一九六三年一开始,常处末位的远东厂职工,打破自卑思想,派人去协昌等厂取“經”,在技术上作了許多改进,結果,在一九六三年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頁。

② 《實踐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280—281頁。



第一季度评比中，这个厂的产品质量跃进到第一位。远东厂的成绩给惠工厂职工很大的震动，工厂领导检查了自满情绪，发动职工寻找质量差的原因，解决了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第二季度评比时，惠工厂也从第一季度的第四名一跃而得到第一名。原来一直比较先进的第一厂的职工，看见两个兄弟厂双双赶到前面，大为震惊。于是全厂排比寻找差距，奋起追赶。在第三季度评比时，第一厂就从上半年的两次第三名，上升到第二名。曾经是最先进的协昌厂，在这种形势下，也急起直追，派出大批职工出去学习，针对本厂产品的主要缺点，猛攻薄弱环节，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上海四家缝纫机厂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也就是说它们互相统一而又互相斗争，使它们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不断互相转化，原来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解决了，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又产生新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展开了新的斗争。结果，就使这四个厂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推动了生产的大大发展。事物就是这样由矛盾着的双方又统一又斗争而推动发展的。

我们任何单位的工作，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既然存在着矛盾，就不能不正视它，认识它，就用不着害怕它，缩手缩脚。矛盾的存在，这不是坏事，揭露矛盾，有意识地运用对立面，促进矛盾的斗争，这就能推动我们工作的发展。

在我们工作中，那些因为有了成绩而骄

傲自满的人，其错误就在于他们眼界狭小、目空一切，不知天高地厚，只看到自己成绩的狭隘天地，看不到别的新天地；只看到别单位的落后，看不到自己还存有落后因素和薄弱环节，因而用形而上学的绳索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他们的这种思想方法，实质上是否定事物的对立统一和斗争，进而否定矛盾的两方又统一又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要学会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必须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进行斗争。形而上学是一种很坏的方法，它使人们对事物不能有正确的认识，阻碍我们工作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僵化。这种方法，“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①。毛泽东同志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方法时曾经说道：“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②形而上学的方法实质上就是主观主义的方法。我们应当进行思想方法上的革命，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自觉地运用辩证方法，清除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等坏东西，使那些还受形而上学思想统治的人们解放出来。

①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00页。



正确认识和處理宗教問題

游 驥 刘 俊 望

宗教早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已产生。从那时起，它一直在精神上毒害着千百万劳动人民。在阶级社会里，它一直是剥削阶级麻醉、欺騙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以前，历史上一些先进的人们，曾經看到宗教的危害性，不断地同宗教进行过斗争。但是，由于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他們不可能正确地認識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規律，因而也无法找到解决宗教問題的正确途徑。只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完全認識了宗教問題，找到了解决宗教問題的正确途徑。正确地認識和处理宗教問題，关系到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同剥削阶级的斗争，关系到劳动人民的团结，因而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形态，同其他社会意識形态一样，不是什么孤立自在的东西，它表现为千百万人的思想信仰，而信仰宗教的人们要在社会上进行宗教活动。宗教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尤其是对于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所作的荒誕无稽的解释，起着麻醉劳动人民的思想，瓦解劳动人民的斗志的作用，而且，它是剥削阶级用来統治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这样，宗教問題就不能不涉及到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宗教問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問題。

毛澤东同志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說，对于我們分析宗教問題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宗教問題中，同样具有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

反动阶级利用宗教维护其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发生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在我国近代条件下，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宗教维护其反动利益，同人民大众发生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主要的社会矛盾在宗教方面的反映。这样性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識形态，“是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們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們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①。就这个意义說，宗教是屬於思想領域內的問題。宗教这一意識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3頁。



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存在，它主要表现在帝国主义分子和国内残存的反动势力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继续利用宗教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复辟。

劳动人民中的教徒由于信仰宗教，同其他劳动人民发生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宗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有神论同无神论的矛盾在劳动人民内部的反映。这一矛盾是大量的，在宗教存在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始终存在的。政治上爱国的、具有民主色彩的宗教职业者和那些实际上以传播宗教为其职业性活动的上层教徒（以下简称这些人为宗教界人士），在政治思想和传播宗教方面，同工人阶级有矛盾，同其他劳动人民也有矛盾。这种矛盾，在我国条件下，一般说来，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我国过渡时期主要的社会矛盾——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宗教方面的反映。

在实际生活中，反映在宗教问题上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宗教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它们的不同性质，正确地加以处理。

根据以上的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既要同一切可能团结的教徒结成爱国的统一战线，坚决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阶级敌人作斗争，肃清国内外反动阶级敌人在宗教中的势力和影响；又要正确地处理宗教这一意识形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矛盾，逐渐削弱宗教在人民群众

中的影响，逐渐促进宗教的消亡。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宗教问题上的首要任务是：把一切可能团结的教徒（包括宗教职业者中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到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来，并且同国内外反动阶级敌人进行斗争，肃清他们在宗教中的势力和影响。

一切反动阶级，当他们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总是要竭力扶植和发展宗教，利用宗教麻痹劳动人民的斗志，从精神上解除劳动人民的武装，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①当他们的反动统治被人民群众推翻之后，他们一定要竭力利用宗教的势力和影响，涣散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并且以宗教作掩护，进行种种破坏活动，阴谋复辟。全国解放前，我国天主教和基督教主要是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工具；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主要是被国内反动阶级所控制的，是他们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工具。全国解放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第208页。



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雖然已被中國人民大眾所推翻，但是，他們在宗教中的勢力並沒有隨之完全消除，他們仍然力圖在宗教這一陣地上同人民較量。潛藏在宗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其他反動分子，常常替帝國主義搜集情報，製造謠言，甚至組織暴亂和進行其他的現行反革命活動；他們散布敵視新中國、反對共產黨、誣蔑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言論；他們利用宗教詐騙錢財、奸污婦女、傷害人命、擾亂社會秩序和生產秩序。他們的這種反革命活動，嚴重地損害着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國經驗證明，工人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後，仍然必須同盤據在宗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其他反動分子進行堅決的鬥爭。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的重要條件之一。

應當看到，反動階級敵人是披着宗教外衣進行破壞活動的，其中有的人在某些宗教的某些組織中還居于當權地位，從精神上控制着教徒群眾，並通過這種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部分教徒的政治生活。因此，有些教徒容易被他們所蒙蔽，難以識破他們的反動政治面目，而且他們可能利用部分教徒的宗教感情，在一定時期欺騙這部分教徒跟着他們走。為了最廣泛地團結廣大教徒群眾，孤立和打擊敵人，我們在每一次具體的鬥爭中，都必須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思想信仰問題同政治問題區別開來；把落后分子同反革命分子區別開來；把教徒進行正當的宗教活動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進行反動

活動區別開來；把一般的宗教組織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動組織區別開來。

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動階級敵人進行鬥爭，需要在各方面進行細致的工作，其中最根本的工作是發動廣大群眾，特別是教徒群眾，把一切可能團結的宗教徒團結在黨的周圍，同他們結成愛國的統一戰綫。而要把廣大教徒群眾充分發動起來，又必須在鬥爭中抓住敵人的反革命活動、違法犯罪活動的具體事實，有領導地在群眾中進行揭發、控訴，剝掉反動階級敵人的宗教外衣，把他們的丑惡面目充分暴露出來，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覺悟水平。

在我們的幾個主要宗教中，特別是在伊斯蘭教和喇嘛教中，長期以來形成了一套極其野蠻、極其殘酷的封建壓迫和封建剝削制度。解放以後，在廣大教徒群眾的要求下，結合社會改革運動，中國共產黨堅決地領導廣大教徒群眾進行鬥爭，廢除了宗教內的封建壓迫和封建剝削制度。這對於肅清反動階級在宗教中的勢力和影響，團結廣大教徒群眾參加革命和建設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無產階級政黨在革命和建設中，應當同一切可能團結的宗教徒結成愛國的統一戰綫。這個統一戰綫的建立，是完全符合於無產階級的利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清楚地看到，宗教徒是一支社會力量。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是勞動人民，團結了他們，就可以發揮他們在革命和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壯大革命和建設的力量。同時，廣大的勞動人民中的教徒，也只有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



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和建设事业，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加予他们的压迫和剥削，才能逐渐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求得彻底的解放。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教徒建立爱国的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人们思想信仰的不同，并不排斥人们在一定政治基础上的合作。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就同一切爱国的教徒结成了爱国的统一战线。参加到这个统一战线中来的，首先是劳动人民中的教徒。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同劳动人民中的教徒的世界观虽然根本不同，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中的教徒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劳动人民中的教徒可以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一道，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周围。在我国，宗教界人士一般说来具有不同程度的爱国思想，其中一部分人还有一定的进步的民主的要求，因此，也有可能把他们团结到爱国的统一战线中来。

党同教徒结成的爱国的统一战线，是我国整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同劳动人民中的教徒的联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第一个联盟——劳动人民联盟的组成部分；同爱国的宗教界人士的联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第二个联盟——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的组成部分。劳动人民中的教徒，是党同教徒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依靠力量，是这个统一战线的

基础。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联盟，是这个统一战线中辅助的但也是重要的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不可忽视的，并且是互相促进的。宗教界人士在劳动人民教徒中有一定的影响，因而争取了宗教界爱国人士，有利于团结劳动人民中的教徒。然而，归根到底，只有在团结劳动人民中的教徒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把宗教界爱国人士团结到爱国的统一战线中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教徒建立爱国的统一战线，首先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提出适当的政治目标，作为共同的政治基础。党同教徒的联盟是政治上的联盟，它必须以一定的政治目标作为基础，而不能以世界观作为基础。很明显，如果以宗教的世界观作为基础，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决不能接受的，劳动人民中的非教徒也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作为基础，这就意味着要求教徒把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作为合作的条件，而这是统一战线本身所不可能提出也不需要提出的要求。

在我国，党同教徒建立爱国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根据不同时期的革命和建设的要求，同时适当照顾到教徒的觉悟程度而提出来的。总的说来，这种政治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反帝、爱国、守法、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为了巩固和加强党同教徒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必须根据上述两种联盟的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不断地对教徒进行反帝、爱国、守法、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尽可能地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符合于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劳动人民中的教徒，我们应该首先看到他们是劳动人民，具有参加革命和建设的迫切要求；同时又要看到他们是教徒，容易通过宗教在政治上接受宗教界上层分子的消极影响以至国内外反动派的思想毒素，从而妨碍他们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因此，对劳动人民中的教徒，应该耐心地、反复地、不断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逐步提高他们的觉悟，动员他们参加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使他们在这种实践中教育自己，分清敌我界限，逐步脱离宗教界上层分子的消极影响，以至国内外反动派的政治影响，同其他劳动人民一道巩固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欧洲同志们的经验，他们认为必须以谨慎的同志态度对待参加天主教联盟的工人，他们不是厌恶这些工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偏见而把他们推开，而是顽强地、机智地、耐心地利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每个行动来启发他们，使他们在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和觉悟的无产阶级靠近。”^①

宗教界爱国人士虽然能够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但是，他们在思想上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影响，有些人划不清敌我界限；他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同程

度地存在着怀疑、抵触和不满的情绪；他们力图扩大宗教的势力，力图通过宗教的纽带加深他们在劳动人民教徒中的影响。根据这种情况，党对宗教界爱国人士，必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不断地推动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改造，逐步使他们脱离国内外反动派的政治影响，帮助他们跟上形势的发展。如果认为党同宗教界爱国人士在政治思想上可以“和平共处”，认为仅仅依靠某种协定而不经过一定的斗争就可以实现同他们的团结，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去做，不可能同宗教界爱国人士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和巩固上述爱国的统一战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还必须对于人们的宗教信仰采取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即：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信仰这种宗教或者信仰别种宗教，在同一宗教中信仰这种教派或者信仰别种教派，过去信仰宗教现在不信仰宗教，过去不信仰宗教现在信仰宗教，都是自由的。宗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人们对于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不能理解和不可抗拒而求助于神秘力量的表现。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信仰宗教的人必然会不断增加，宗教必然会逐渐消亡。但是，在宗教消亡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时，有一些人信仰宗教，也是必然的。对于不信教的人和放弃宗教信仰的人，不能强迫

^① 《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7页。



他們信教；對於信教的人，也不能強制他們放棄宗教信仰。信仰宗教的人，有進行正當宗教活動的自由；但是，決不能因為進行這種活動妨害國家、社會、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其他權利，更不能利用宗教進行反革命和違法活動。事實證明，只有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才能在人民內部正確處理宗教徒同國家之間、宗教徒同非教徒之間以及不同宗教或者教派的教徒之間的关系，增強人民內部的團結。

三

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在宗教問題上的另一個任務是：發展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地對宗教徒加強思想教育，以逐步消除產生宗教的根源，逐步削弱宗教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促進宗教消亡。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宗教妨礙人們正確地認識客觀世界，妨礙人們進行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從而阻礙社會的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同宗教的唯心主義世界觀是根本對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要按照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改造世界，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革命鬥爭，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把人們從自然的、社會的和精神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必然要遭到來自宗教方面的阻撓，不可避免地要同宗教這一意識形態進行鬥爭。

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主張同宗教徒在一定的政治基礎上建立愛國的統一戰綫，一貫

採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是，這絲毫也不意味着對宗教可以採取中立的態度，可以在思想領域內同宗教“和平共處”，可以對群眾遭受宗教的束縛置之不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最徹底的無神論者，是同一切宗教對立的。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就說過：“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決不能和任何反動的唯心論建立統一戰綫。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綫，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① 在國際工人運動史上，機會主義者曾經在這個問題上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認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不必過問。列寧堅決反對過這種機會主義的觀點。他說：“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政黨，宗教並不是私人的事情。我們的黨是覺悟的先進戰士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聯盟。這樣的聯盟不能夠而且也不應當對信仰宗教這種不覺悟、無知和蒙昧的表現置之不理”^②，“無產階級專政應當堅持不懈地使勞動群眾實際上從宗教偏見中解放出來”^③。

認識到必須同宗教作鬥爭，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僅僅認識到這一點還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必須善於同宗教作鬥爭。列寧說：“我們應當同宗

① 《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00頁。

② 《社會主義和宗教》。《列寧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4頁。

③ 《俄共（布）黨綱草案》。《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8頁。



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①。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宗教作斗争，应当服从党的基本任务，服从“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应当具体地、根据当前在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提出这个问题。”^②同时，还应当紧密结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向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科学知识^③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

从根本上来讲，积极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对于宗教的消亡具有决定意义，它是促进宗教消亡的根本途径。因为要促进宗教的消亡，首先要消除宗教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只有消灭了阶级和剥削，大大发展了控制自然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高了人们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水平，宗教才有可能消亡。毛泽东同志指出，群众的宗教迷信观念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結果。”^③因此，党首先应当领导群众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在我国，随着人民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宗教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正在逐步消除，宗教徒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水平正在提高，许多宗教徒已经或者正在摆脱宗教的束缚和影响。

然而，这并不是说，宗教在群众中的影

响，会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自行消失。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为促进宗教的消亡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但是，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的提高，还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政党，对人民群众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向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科学知识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这种宣传教育，对于促使人们摆脱宗教偏见，促使宗教消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客观上还存在产生宗教的根源的时候，人们是否信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水平；在产生宗教的根源消除以后，由于人们的意识往往落后于物质条件的变化，宗教并不会立即消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于摆脱宗教偏见，更具有决定的意义。

应当看到，经常在人民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科学知识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水平，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这种宣传教育工作。忽视这种工作，就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让宗教迷信思想泛滥成灾，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当然，过分夸大这种宣传教育的作用，认为单纯依靠宣传教育就能彻底解决人们的宗教信仰问题，也是不对的。

①②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79、380、382页。

③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4页。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这种宣传教育工作。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我们党把这种宣传教育同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启发群众通过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自觉地、自愿地破除宗教迷信观念。在进行这种教育时，尽可能地作到谨慎，耐心，细致，照顾群众的觉悟程度，避免简单粗暴的作法。我国的实践证明，这样进行宣传教育的结果，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人民内部的教徒同非教徒的团结，不是挫伤了而是提高了教徒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不是阻碍了而是有助于党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基本任务的实现。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来就反对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或者其他变相的强制方法，同宗教作斗争。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①用强制人们不信教的办法，是不能使宗教消亡的。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有其本身的客观规律。宗教观念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只有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并通过人们的自觉，才能改变。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说过：“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②事实上，用行政命令等强制方法同宗教作斗争，不但不会收到效果，反而会引起宗教徒的不满，挫伤他们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同时，还可能被反动阶级敌人所利用，煽起宗教徒的护教情绪和宗教狂热。这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

人们摆脱宗教的束缚，都是不利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同宗教作斗争，决不意味着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把促使宗教消亡的斗争置之度外，采取坐待宗教消亡、甚至听任宗教势力扩张的放任自流态度。我国的经验证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宗教不可避免地要逐渐削弱，这是总的趋势。然而，就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宗教的削弱也不是直线下降的。在总的下降趋势中，还会有一定的起伏。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认识和掌握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运用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积极进行工作，加强无神论宣传，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使人民群众自觉地放弃宗教迷信观念。

* * *

宗教问题的彻底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宗教问题上仍然面临着艰巨的、复杂的、长期的任务。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内，阶级斗争必然要在宗教方面表现出来。在思想领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同宗教的斗争，也是长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正确认识党在宗教问题上的任务，正确地处理宗教问题。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②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35页。

